第 50 卷 第 6 期
2013 年 11 月

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
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(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)

Vol. 50, No. 6
Nov. 2013

辽金元诗歌的研究成就与未来的任务

查 洪 德
(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十一卷本《中国诗歌通史》的出版,确实是中国诗歌史研究的一大成果。其中的辽金元卷,则是辽金元这一特殊时期诗歌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梳理。读这一卷书,深感它是一部厚重的断代诗歌史著。在欣喜的同时,也引发了关于辽金元诗歌研究的一些感想。

一、《中国诗歌通史·辽金元卷》成就

1. 21 世纪文学史家观念和眼光

辽金元诗歌,即使是广义概念的辽金元诗歌,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中,篇幅寥寥。这一时期的诗人诗作,除元好问等极少数诗人和一些散曲作品外,都不入文学史家之眼。它们被放在不受关注的角落。不承认辽金元诗歌的价值,这当然是以往文学史家的偏见。这种偏见由来已久,根深蒂固,很难在短时期内清除。进入 21 世纪不久出版的《中国诗歌通史》,首先在篇幅上打破了固有的格局,给了辽金元一卷的篇幅,在宏观上肯定了辽金元诗歌的地位,体现了新世纪文学史家的眼光。这一格局的改变,绝对不仅仅是部头大小的外在直觉,它具有多方面的文学史意义,将对今后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,特别是诗史研究和教学,产生多方面的影响。其意义,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,而被人认识。

2. 第一次在广义诗歌观念下,把辽金元诗歌的发展作了系统梳理

《中国诗歌通史·辽金元卷》,既是中国诗歌通史的一卷,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。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,它是一部分体断代的文学史,即断代的诗史。作为断代诗史,它是第一部系统梳理辽金元诗歌发展的学术著作。辽、金、元三代,分而言之,是三个前后相接并具有共同性的朝代。合而观之,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。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,从时代分有辽诗、金诗、元诗,从作者的种族看,有汉族诗人诗作和其他民族诗人诗作,从体裁分则有诗、词、曲之不同。但所有这些,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辽金元这同一时空中的创作。既然是同一时空中的诗歌创作,就应该通而观之,以通观的眼光来看待。所谓通而观之,应该体现三个融通,即辽金元的历史贯通,各民族诗歌的融通和诗、词、曲的横向联通。《中国诗歌通史·辽金元卷》也试图做到这三点。有些方面做得好一些,有的方面还明显不足。做得最好的,首先是纵向史的贯通。尽管各部分分别成于不同作者之手,但看来各位作者都有历史贯通的意识,所以这方面做得好一些。其次是民族的融通。作者是把不同民族诗人及其作品作一体观的,尽管非汉族诗人作了专章,但在写作中还是贯穿了多民族一体的观念。当然,客观上看,这些非汉族诗人的诗作,都属于汉语创作,其中体现的观念,也与汉族诗人诗作大体相同。做得不理想的是诗、词、曲的联通。将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文体的研究互相割裂,是不应该的,但却是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的定势。这一问题,在这卷书里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。毫无疑问,这应该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,辽金元文学研究应该着力突破的关节点。这一突破无疑是困难的。将辽金元时期的诗词曲做一体观,除了需要研究者有驾驭多种文体研究的知识与文献储备外,关键是要能很好把握一个时代共有的文化精神。

3. 时代特色与独到见解

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,这样一个特殊时期,其诗歌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色。本卷在纲目设计和撰稿中,都努力体现其特色。这些特色,主要是民族文化特色、地域特色,以及这些特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。辽金元诗歌的特色是历史的客观存在,对于本卷撰写者来说,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它,把握得越准确、越到位,就越能较好地揭示其特色。可贵的是,本卷撰稿人有这种自觉。

本卷成于多人之手,由五位撰稿人分别写成。在当前的学术界,成于众手之作,多被看成是拼凑,水平往往会受到质疑。而本卷则不然,它是由相关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撰稿,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写成,尽管难以避免行文风格不一、互相照应不够等缺点,但每一部分都坚实深厚,具有撰稿人的独到见解,而这些见解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之上,经得起考验的,使得本卷展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。

二、辽金元诗歌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

辽金元诗歌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,但直到今天,其成就还没有得到客观认识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和问题。这些问题,有些比较容易解决,有些则一时难以改变。辽金元诗歌研究,还是任重道远。

1. 清除认识的偏见

文学史研究界对辽金元诗歌(特别是元诗)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,其影响也广泛而深刻。有些偏见现在看来容易破除,但要将这些偏见从人们观念中全部清除,是非常困难的。

人们对辽金元诗歌的偏见,自明代以来影响至今。史学家陈垣就批评过明人的这种偏见,说:"(元之)儒学文学,均盛极一时。而论世者轻之,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,明人蔽于战胜余威,辄视如无物,加以种族之见,横亘胸中,有时杂以嘲戏,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谓胡元诗人贯云石、萨天锡欲矫宋诗之衰,而膻气乘之云云,其一例也。"①陈垣还论证了明人不读元诗,感慨:"可见元人之诗,久不在明人目中也。"明人也有比较客观看待元诗的,但其观点影响不大。如李东阳,他认为元诗是中国诗史发展的一个阶段,有自己的特点:

> 诗之为物也,大则关气运,小则因土俗,而实本乎人之心。……世殊地异,而人不同,故曹、豳、郑、卫,各自为风;汉、唐、宋之作,代不相若,而亦自为盛衰。逮至于元,其变愈极,而其间贤人义士,往往奋发振迅,为感物言志之音者,盖随所得而成焉。②

在他看来,元诗也与汉魏六朝唐宋一样,有着自身不可取代的特色:"汉魏六朝唐宋元诗,各自为体。譬之方言,秦晋吴越闽楚之类,分疆画地音殊调。气机所动,发为音声,随时与地,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。"③但这些观点,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界没有影响。20 世纪有些著作着意贬低元代,存在着大量的主观解读甚至故意曲解。举一个影响很大尽人皆知的例子。有一条证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材料:"滑稽之雄,以儒为戏者曰:'我大元制典,人有十等:一官二吏,先之者,贵之也,贵之者,谓有益于国也。七匠八娼,九儒十丐。后之者,贱之也,贱之者,谓无益于国也。'嗟乎,卑哉!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,今之儒也。"既表明文人地位低下,又说明元代愚昧黑暗,文化不昌明。这段话出自著名宋遗民谢枋得的文章《送方伯载归三山序》。细读原文,才知道作者本意正好相反,是批判宋代科举制度制造了科举程文之士,只会作场屋无用之文,造成了文化厄运。在谢枋得看来,进入元代,文化厄运即将结束,人们可以抛弃"场屋无用之文"而作"经天纬地"有用之文,"文运大明,今其时矣"。④ 像这类误读甚至有意歪曲的东西不除,怎么能对元代文学包括元诗有客观的评价?

2. 了解元代文坛

元代是一个"文倡于下"的时代。元人许衡说:"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,苟在上者无以任之,则在下之任也。"由于元政府在文化风教上不作为,在下的文人们自觉担当起兴起文教、重建纲常的任务。明人何景明有言:"文之兴于盛世也,上倡之;其兴于衰世也,下倡之。倡于上,则尚一而道行;倡于下,合者宗,疑者沮,而卒莫之齐

---

① 陈垣: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卷八《总论元文化》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影印《励耘书屋丛刻》本,第 259 页。

② 李东阳:《怀麓堂集》卷二十四《赤城集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李东阳:《怀麓堂诗话》,李庆立校释本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,第 179 页。

④ 谢枋得:《叠山集》卷六《送方伯载归三山序》,《四部丛刊》续集影印本。

也。”①不管他怎样界定盛世与衰世,但他认为,衰世也可以有“文之兴”,只是衰世之文,不是“倡于上”而是“倡于下”。倡于上则“尚一”,即其风气宗尚显示出相对的统一性;倡于下则不“一”,即显示出相对的多元性。“倡于下”、相对多元,正是元代文学与文学思想的特点。倡于上,政府有提倡,也就有干预;倡于下,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,同时也就摆脱了政治的强力干预。元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“文倡于下”的时代范本。认识了这一点,我们就必须用多元价值标准来评价元诗,才可能客观认识元诗的价值。如果一定要用美刺讽喻、抒情言志、移风易俗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标准衡量元诗,就可能忽略了元诗多方面的价值,甚至其中珍贵的东西。

比如有人认为,元诗的社会批判意识不强。可以明确地说,这种看法是错误的,元诗的批判意识和批判力度,超越以往。只是这种批判与其他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:它没有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(白居易《寄唐生》)直接目的,只是直写眼前所见、心中所感。诗人不是有意写给谁看,反倒更真切。举例看,元人李思衍有《鬻孙谣》:“白头老翁发垂领,牵孙与客摩孙顶。翁年八十死无恤,怜汝孩童困饥馑。……客谢老翁将孙去,泪下如丝不能语。零丁老病惟一身,独卧茅檐夜深雨。梦回犹自误呼孙,县吏催租更打门。”这样的诗,越读越感人,读者从中体会到的是那种揪心之痛和凄惋之情。把这样的诗和《卖炭翁》相比,孰高孰低,有可品评。

3. 理解元代文人

元代文人对诗的理解不同于其他时期,在一部分元人心中,诗就是写心的,诗只为自己而作。

元代文化精神中有一种极可贵的东西,就是对文人自身价值的发现。当治国与明道都与自己无关时,文人们才发现,原来治国与行道,都是自身以外的东西。既然是文人,其价值和优势就在于自身的“文”,即文化、文才。“文”是他们的自身属性,也是他们社会角色的优势。这时才发现了真正属于自身的价值,其价值不依附于政治,不依附于道统,为他们自身所具有。不治国,不明道,其价值依然,不会因社会的改变而失去。与“文”的属性相连,还有高雅不俗的生活情趣。曾被孔子赞赏的曾点舞雩之适,在忘怀世事的轻松中,享受自然与文人雅趣,追求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独立。在与尘俗的鄙野、官场污浊的鲜明对比中,展示清雅之趣,突出文人们独居文化高地优越感的人生价值,就成为很多文人自我调适的选择。他们有文化,有清趣,以此区别于世俗的鄙庸和富贵者的污浊。诗人和诗论家戴表元认为,诗人之“清能灵识”是独得于天者,天既不以之赋予世俗之人,也不赋予富贵中人。文人有此,足以傲世②。赵文进一步认为,人之“清才”远比富贵难得,因而也更可贵:“宰物轻与人以富贵,重与人以清才。”③天地间只有清才最可贵。贡师泰说:

> 富贵可以知力求,而诗固有难言者矣。是以黄金丹砂,穹圭桓璧,犹或幸致,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,自有一种清气,岂知力所能求哉?④

文人在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中获得了心灵的平衡与满足。元代文人把诗看得很重,诗是他们生活不能缺少的部分,是心灵的寄托,他们自言万事皆废,所不废者,唯读书与作诗。释善住诗云:“辩才已老犹临帖,子美虽贫不废诗。最是世间清胜事,此中风味少人知。”⑤越是老贫,越不能废诗。刘将孙描写文人们以诗会友,朋友之间,“各以诗为日用”,尽管“四方行李”,也要“每为会期,远者二三岁一聚,近者必数月,相见无杂言,必交出近作,相与句字推敲,有未稳处,或尽日相对无一言,眉间郁郁,参差倚阑行散,馈食不知,问事不应”⑥。元季丧乱,文人们也将其悲忧愉逸之情寄之于诗。舒 《群英诗会序》说:“吾乡诸友,遭群

① 何景明:《何大复先生集》卷三十四《汉魏集序》,明刻本。

② 戴表元:《吴僧崇古师诗序》,李军等校点《戴表元集》,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124 页。

③ 赵文:《青山集》卷一《王奕诗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 贡师泰:《葛逻禄易之诗序》,廼贤《金台集》卷首,北京:中国书店《海王邨古籍丛刊》影印《元人十种集》本。

⑤ 释善住:《谷响集》卷三《春夜杂兴十八首》之十八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⑥ 刘将孙:《养吾斋集》卷十《跖肋集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凶攘窃之余,而复形诸咏歌,发其铿锵之音,宣其湮郁之气,和其性情之美。或登高临深,或良辰美景,或悲忧愉逸,一于诗是寄。"①宋元之际的诗人谢应芳有诗云:"秋菊春兰各有时,颓然老我一书痴。脚跟不识青云路,头发空成白雪丝。怕醉有时曾止酒,遣闲无日不吟诗。"②大致同时,另一位诗人也有诗说:

> 平生寡嗜欲,所好在吟诗。朝夕吟不已,鬓边已成丝。幼女颇解事,长跪陈戒辞。吟止适情性,勿使精神疲。深感吾女言,而我乐在兹。一日不吟咏,满怀动忧思。阿女顾予哂,予心还自怡。春风入庭院,花阴满前墀。清兴不可遏,把笔更须题。③

诗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,没有诗,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。

对于元代很多诗人来说,写诗是心灵的需要。他们写诗,排除一切功利目的,黄溍赞赏朋友的作诗态度,说他"遇风日清美,辄与胜流韵士,酣嬉于水光山色间。所为诗,直以写其胸中之趣,不苟事藻饰求媚俗也"④。写诗不是给别人看,别人如何评价,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,如王冕画梅之"不要人夸好颜色"(《墨梅》四首其三)。他们作诗,不过"取之胸中,施之笔下,如出自然。……能自乐其乐。遇好泉石则吟,好风月则吟,好朋友则吟"⑤。我自作诗,我自写我之心,娱我之情,或泻其无聊,与他人无关。以往研究者认为,这是逃避社会,不关心现实。认为这样的诗歌,内容贫乏,缺乏社会批判意识。现在看来,这种认识应该改变。文学是写心的,写心之诗,展示了诗人的心灵和情绪,这样的诗,就是有价值的。好诗是自然写出来的。元代诗论家刘将孙对此有很好的论述,他认为,诗应如九皋鹤鸣,"感赏于风露之味,畅适于无人之野,其鸣也,非以为人媚",是完全自然自由和无功利的。诗之感人,也是自然遇之,自然感动,"其闻也,非其意。而得之缥缈者,无不回首萧然",如此自然感人之声,即使是"肉食之鄙夫,筝笛之聋耳,将亦意消而神愧"。⑥ 宽松的环境,自然的状态,自由的心灵,应该是诗歌发展最好的条件。元代具备这样的条件。如果你承认,文学本质上是写心的,文学说到底是心灵的东西,那你应该认可元诗,并因其在中国诗史独具特色,而加以珍视。

了解元代文坛,理解元代文人,都是要转换眼光。清除偏见不易,转换眼光更难。辽金元诗歌研究,依然任重而道远。

(责任编辑　何　方)

---

① 舒　:《贞素斋集》卷二《群英诗会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② 谢应芳:《龟巢稿》卷十六《生日口号二首》其二,《四部丛刊》三编影印傅氏双鉴楼藏抄本。
③ 邓雅:《邓伯言玉笥集》卷一《偶题》,清抄本。
④ 黄溍: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卷三十一《信州路总管府判官谢公墓志铭》,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元刊本。
⑤ 牟巘:《陵阳集》卷十三《挂蓑集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⑥ 刘将孙:《养吾斋集》卷十《九皋诗集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